南湖传统民俗文化研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刘茜著

刘茜，女，1975年生，四川郫县人。200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嘉兴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

当文化逐渐抽象为一个符号、一种理念之时，我们却在那远离尘嚣的田野乡间，在那曲水环抱的弄堂深巷，在那喧嚣沸腾的店铺酒肆，在那梵音缭绕的庙堂观宇，看到了文化最为真实、最为生动的存在。

自序

嘉兴作为江南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有着悠久而丰富的民俗文化。但长期以来，由于民俗学一度处于边缘化状况，对地方民俗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并主持。嘉兴市政府在这方面组织开展了许多研究，为本地区民俗文化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如由中国嘉兴南湖船文化节组委会办公室主编的《中国嘉兴南湖船文化节》，由嘉兴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主编的《嘉兴市歌谣谚语卷 》，由中国嘉兴市节庆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主编的《江南秀·秀嘉兴》等。当然这些作品基本属于资料收集性质，并不属于研究性专著。随着民俗热的升温，近几年南湖民俗文化已逐渐为一些学者所关注，他们多将南湖民俗作为江南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之展开研究。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由日本铃木满男主编的《浙江民俗研究》，姜彬主编的《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等均将南湖民俗风情作为其中的个案加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专门研究嘉兴地方民俗文化的专著也开始出现，如陆殿奎主编的《嘉兴市故事卷》，王富基、袁克露主编的《嘉兴民情风俗》等。这些专著表明嘉兴民俗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前贤已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收集材料方面，这为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与缺陷。如民俗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民间文学、神话传说，还包括人们的生活习俗、信仰观念等方面。就以往的成果来看，多数研究仍然停留于对南湖民俗现象作个案性研究，鲜能从宏观上揭示民俗文化的整体特征与人文内涵，故其成果也显得零散而不成体系。再如以往的民俗著作多以收集材料为主，很少就民俗问题作理论探讨，故未能触及到民俗现象的产生及演变的深层根源，也未能将民俗现象视为人们无意识的精神现象的再现，故很少能透过民俗现象揭示嘉兴人的人文精神取向。

本文在前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生态学与文化学纳入到南湖民俗文化研究范畴之中，不仅探讨了嘉兴民俗生成的根源，而且揭示了隐含在纷繁芜杂的民俗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并结合当前嘉兴民俗发展的现状探讨了嘉兴民俗的未来前景。

在方法论上，本文主要采取了田野调查与文献阅读、个案分析与综合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注意到了对民俗现象的理论探讨，也注意到了对民俗现象本身的收集与整理，并尽可能地将民俗置于生态环境中，回归其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将南湖视为嘉兴市区的文化标志，对南湖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围绕嘉兴市区所辖的南湖区与秀洲区及二区下辖的新丰镇、余新镇、凤桥镇、大桥镇、七星镇、东栅街道、王店镇、洪合镇、新塍镇、王江泾镇、油车港镇、新城街道等十镇二街道展开，也部分地涉及到嘉兴下辖的个别县市。

前言

“民俗”即指民间的风俗习惯，是一个国家、地区长期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民俗”一词起源甚早。春秋战国之时，传世文献中已有对“民俗”、“风俗”二词的明确记载。《管子·正世》云：“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荀子·强国》亦云“入境，观其风俗。”可见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认识到了“民俗”的普遍存在及其在政治教化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将“民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却始于近现代。近年来，随着民俗学的进一步发展，其研究的范围已不再停留于对民俗现象的罗列，而是进入到民俗学的理论建设阶段，它不仅涉及到对民俗生成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探讨，还深入到了对隐藏于民俗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的揭示。民俗学专家陈勤建先生说：“不论是民俗的次生态还是再生态的泛民俗主义文化，其间始终蕴含着该民俗最初的精神意象，包孕着创造这一民俗事象集体的心愿。”[①]这已将民俗学纳入到文化学的范畴。

民俗大多以类型或模式的形态存在，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区域特征，它是区域人群中个人文化生命特征的重要标记，因而对区域民俗的研究将是考察区域文化特征的重要途径。

嘉兴的文化形态从整体上可分为稻作文化、桑蚕文化与水乡文化三大类型，而这三种文化形态早在上古时期的马家浜文化中已初现端倪。在距今有六七千年的马家浜文化遗址中，我们不仅发现有大量的稻谷遗存、稻作生产工具以及兽骨的遗骸，还发现了陶制的纺轮、骨锥、骨针等纺织工具以及葛麻纤维织造的纬线起花的罗纹编织物。这就说明早在上古时期，嘉兴地区已出现了稻作生产、渔猎经济方式以及原始的纺织手工业技术。除此之外，马家浜遗址中还发现了长方形房屋遗迹以及带榫卯的建筑木构件，这也说明还在六七千年前，嘉兴地区的先民们便已采取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水乡民居样式——木构地面建筑与干栏式建筑。由此可见，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嘉兴文化形态生成的根本原因。

嘉兴的文化类型又决定了嘉兴民俗的基本特征与发展方向。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嘉兴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包括生产习俗文化、信仰习俗文化、饮食习俗文化、民居习俗文化、婚丧习俗文化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

所谓“观民俗可以知民风，观民风可以知民性，观民性可以知国性”，任何

[①] 陈勤建：《论民俗与民族精神》，《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种民俗都是特定人们的精神意志的生动体现，是人们未经雕琢的原生态精神生活的生动再现。嘉兴的民俗同样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嘉兴人的性格特征与精神气质，而且生动地演绎了嘉兴人深厚的文化内蕴与独特的人文追求。纵观嘉兴的历史，稻作与桑蚕生产习俗塑造了嘉兴人勤劳淳厚、秀慧工巧的性格特征；发达的商业经济习俗培养了嘉兴人积极进取、务实诚信的可贵品质；温湿多水的自然环境则涵养了细腻柔顺、崇文尚墨的文雅习气。嘉兴人这些独特的精神气质构成了嘉兴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它不仅内在地规定着嘉兴文化的基本品质，也预示着嘉兴未来文化的发展走向。

目　录

第一章 南湖传统民俗文化形成的根源
第一节　马家浜文化——南湖文化的源头
第二节　稻作文化的形成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二、稻作生产的悠久历史
三、稻作生产与稻作文化
第三节　桑蚕文化的萌生
一、桑蚕生产的悠久历史
二、桑蚕生产与桑蚕文化
第四节　水乡文化的孕育
一、水乡的地理特征
二、水乡文化

第二章　稻作文化与南湖传统民俗
第一节 稻作生产习俗
一、生产循环方式
二、灌溉方式
三、民俗活动
四、服饰习俗
第二节 稻作生产与民间信仰
第三节 稻作生产与经济贸易习俗
第四节 稻作生产与饮食习俗
第五节 稻作生产与民间文学

第三章　桑蚕文化与南湖传统民俗
第一节　桑蚕文明与生产习俗
第二节　桑蚕文明与蚕神崇拜
一、民间信仰习俗
二、辟邪占卜习俗
三、忌禁避讳习俗
第三节　桑蚕文明与民间礼俗
一、桑蚕文明与生活习俗
二、桑蚕文明与婚姻习俗
三、桑蚕文明与丧葬习俗
第四节　桑蚕生文明与手工业、商业习俗
第五节　蚕桑文明与民间文学

第四章 水乡文化与南湖传统民俗
第一节 水乡地理环境与名胜古迹
一、嘉兴的著名湖泊
二、嘉兴的运河
三、水城的名胜
四、水城的桥
第二节 水乡文化与民居风俗
第三节 水乡文化与交通习俗
第四节 水乡文化与生活习俗
一、饮食习俗
三、民俗活动
第五节 水乡文化与节日习俗
第六节 水乡文化与民间文学
一、民间故事
二、民间歌谣

第五章 巫鬼文化与崇祀习俗
第一节 神灵崇拜与庙祠遗踪
一、图腾崇拜——龙崇拜
二、自然神崇拜——庆农作物生日
三、人神崇拜——庙祠崇祀
第二节 佛、道之风与庙观兴衰
第三节 神灵信仰与庙会习俗
第四节 神灵信仰与传统节气

第六章 南湖传统民俗文化与人文精神
第一节 生产习俗与人文精神
第二节 商业习俗与人文精神
第三节 水乡地理与人文精神

第七章 南湖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命运与未来走向
第一节 南湖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下境遇
第二节 南湖传统民俗文化的未来走向探析

附录一　嘉兴稻作生产区的民间文学作品
附录二《太保书》

参考文献举要

后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湖传统民俗文化研究

嘉兴南湖地处太湖流域的水网地带，因位于嘉兴城南而得名。南湖不仅是江南之风景名胜，更是嘉兴的文化标志。几千年的历史沉淀，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活方式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第一章　南湖传统民俗文化形成的根源

第一节　马家浜文化——南湖文化的源头

嘉兴地处太湖流域，自古沟壑纵横、河泽密布，乃古越人聚居之地。据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嘉兴已进入了高度的文明，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辉煌于公元前四五千年的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因1959年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定名。马家浜文化遗址上承余姚河姆渡文化，下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其类型分布十分广阔，它东临至海，北达长江，西到天目山麓与茅山山脉，南抵钱塘江北岸三、四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其中在嘉兴地区的重要遗址包括嘉兴的马家浜、吴家浜、干家埭、钟家港；桐乡的罗家角、谭家湾、张家埭、新桥、吴家墙门；海宁的郭家石桥、坟桥港；　海盐的彭城；平湖的大坟塘；嘉善的小横港、大往遗址等等。在太湖流域的苏、锡、常、沪、杭、湖地区中，有湖州邱城、杭州吴家埠、苏州越城、吴县草鞋山、上海青浦彩泽下层和常州圩墩、武进潘家扩的下层等地带。从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遗存来看，马家浜文化属典型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类型，它不仅奠定了早期太湖流域的文化形态，也成为华夏文明的又一个源头。

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城南偏西7.5公里，北及东北临九里港，西有坟屋浜，南为马家浜，是一个三河交叉的平原。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达15000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对遗址的中部进行了集中的发掘，共布探方5个，计213平方米。遗址可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以灰黑色黏土为主，并有红烧土层和淤泥层，厚达12—80厘米。下层为含有大量腐烂的兽骨碎片的黑色黏土，厚达15—75厘米。从发掘的遗存来看，上下两个文化层均包含了大量的兽骨，近2000斤，尤其是在下层底部，其厚约一厘米，几乎全为兽骨堆积。这些兽骨除动物遗体的残骸外，还被制造成各种样式的工具，如骨管、骨锥、骨针、骨凿、骨镞等。考古工作者对这些骨类进行了鉴定，认为这些兽骨大都是水牛、鹿、四不象、野猪等动物的兽骨。可以推测，大约在六七千年左右的马家浜周围一带应有森林分布，但又因遗址中并未发现虎、豹等肉食类猛兽，因而这一地区应远离大山丘或山麓的，其森林应分布于丘陵地带之上。对于这一推论还可以通过马家浜文化的另一个分布区——罗家角遗址得到印证。罗家角遗址位于嘉兴桐乡市石门镇的罗家角村，遗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300米，总面积12万平方米，是浙江省迄今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979年，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达1338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厚20—350厘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在此，考古工作者出土了2000多斤兽骨和骨器。经鉴定，这些兽骨与骨器大多属于梅花鹿、麋鹿、水牛、猪和象等偶蹄类动物的遗骸，这说明罗家角周围同

样有森林覆盖，当然此处仍未见大山丘与山麓的凶猛动物，同样也证明此处的森林也应覆盖于丘陵之上。此外，在马家浜与罗家角遗址中还有鲸、龟、扬子鳄、鲤、青鱼、软体动物的蚌等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尤其是在马家浜的下文化层中还发现了碳化圆角菱（与现在的南湖菱相仿）。由此可见，这一带地区应是地势低平、湖泽密布，且临近海域的地貌特征。此外，从遗址中出土的网坠、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可以判断渔猎经济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家浜文化中的罗家角遗址中发现有稻谷遗存。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罗家角遗址中发掘出了稻谷156粒，其中粳谷55粒，籼谷101粒。可见这一时期，先民们已开始种植水稻，并已掌握了培植粳稻的技术。而在遗址中发掘出土的磨光穿孔石斧、弧背石锛和角骨制耜、凿等工具也同样证明了先民开始用磨制石器和骨角器来开垦农田、栽种水稻。此外，马家浜、罗家角遗址还出土了各式的陶器，这些陶器主要以外红里黑或表红胎黑的泥质陶为特色，多素面，外表常有红色陶衣，器形以腰沿釜、喇叭形圈足豆、牛鼻形器耳的罐、圆锥足鼎等具有代表性。当然这些陶器中大部分是用于先民的祭祀活动，但也有部分是用于储存粮食的器皿，如陶釜等炊器，这也说明稻米在当时已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因而从出土的遗存可以推断，早在六七千年前，嘉兴周围一带地区有大面积的平原存在，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水稻种植与渔猎经济是人们最为重要的生产方式。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在马家浜、罗家角遗址中发掘出了陶制的纺轮、骨锥、骨针等纺织工具，这也证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嘉兴地区的先民们已掌握了原始的纺织技术。与此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马家浜文化中的另一个遗址——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发掘出了葛麻纤维织造的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这也充分证明了原始的纺织业已在这一带地区出现。

在出土的遗存中，马家浜遗址还发掘出了长方形的房屋遗迹：南北7米，东西3米，门朝东，周边一圈柱洞，尚有残存的木柱，有的木柱洞底垫放木板。同样的，考古工作者在罗家角遗址中也发掘出了带榫卯的建筑木构件，在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同样发现多处房屋的残迹。从这些房屋残迹可以进一步推断，当时这些地区已经有了榫卯结构的木柱，人们在木柱间编扎芦苇后涂泥为墙，然后再用芦苇、竹席和草束铺盖屋顶。从发掘报告看，居住面是经过夯实的，里面还拌有砂石和螺壳；有的房屋室外还挖有排水沟。由此可见，这一带民居的建筑应是以木构地面建筑和干栏式建筑为主要样式的。而这一建筑样式也基本奠定了现今江南水乡的民居格局。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到，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早在六七千年前，马家浜的先民们已在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类型。而从现今嘉兴文化的格局来看[①]，上古时期马家浜形成的这些文化类型已基本决定了嘉兴文化的未来走向。由此可见，一个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对该区域文化特质的形成起着至关重

①从文化类型上来看，嘉兴的文化形态可以分为稻作文化、桑蚕文化、水乡文化等三大类型。

要的作用。这似乎以例证的形式再一次证明了文化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关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美国著名学者朱利安·斯图尔德曾在1955年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观点[①]，其基本的理论旨趣在于对文化适应环境的进程作出说明和解释，并试图探求富有地域性差别的特殊文化模式和文化特征的来源。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可以在以下两个层次上理解：其一是自然观和生态观，即充分重视对文化得以产生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进行深入探究。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动态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人与外部世界不断沟通和协调的过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文化类型、文化性质、文化变迁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异性，在很大程度上讲都是人类在适应和改造山脉、河流、海洋、气候等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一种文化的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而这种文化土壤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原汁原味的自然环境及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形成的生产方式。因而，要深入地探究一种文化，必然离不开对自然环境的考察。其二是整体观、系统观和共生观。斯图尔德将一种文化视为由各种具有特殊内涵的文化要素（子文化）的共生体。一种文化通常都是由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体，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层次性和结构性等特点。这正如美国另一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所言：“无论在什么地方，文化都绝非文化特质的单纯相加或简单汇聚，文化要素总是组成为系统。每种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和统一性，它依赖于一定的基础，按照一定的原则或系统组织起来。”[②]文化生态学在进行文化研究时强调既要善于把握一种文化中各个文化要素的具体内涵，又要善于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文化的特质，系统地考察各文化因素与环境之间、各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一文化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深入分析马家浜遗址所蕴含着的文化信息，并由此对嘉兴民俗文化进行探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广阔的思路。

第二节　稻作文化的形成

所谓稻作文化是指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方式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它不仅包含了水稻的育种、栽培、收割、储藏等一系列的稻作生产方式，而且包含了由稻作生产衍生出的信仰、饮食、衣饰、艺术等多种民俗风情。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先后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包括河姆渡、马家浜（罗家角文化是其组成部分）、崧泽、良渚等几个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数十处稻谷遗存，尤其是河姆渡和罗家角文化中的稻谷遗存均有六七千年以上的历史，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稻谷遗址，这就充分证明了江南太湖流域乃是我国水稻的最早发源地之

①（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 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 年版，第 8 页。
②（美） L·A·怀特著，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06 页。

一。嘉兴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境内雨水充足、土壤肥沃、地势平坦，是水稻栽培的优生地带。考古资料显示，位于嘉兴桐乡市石门镇的罗家角遗址中，不仅有稻谷的遗存，而且有开垦农田、栽种水稻的工具，如磨光穿孔石斧、弧背石锛、骨制耜、凿等等，可见在上古时期，嘉兴地区的先民们便已掌握了基本的水稻栽培方法，这就表明在人类文明的诞生之初，稻作文化已成为嘉兴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远古时代，一种文明的诞生必然与其固有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嘉兴稻作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水稻生产的进行对自然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丰富的水源、良好的土质、适宜的温度、充足的光照等都是必要条件。嘉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水稻的栽培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在水源方面，嘉兴地处长江下游与太湖流域，境内湖泽密布，河道长达 13000 余公里，河湖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 8.05%，水量充足。地面水资源年均约 16 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年约 3.5 亿立方米，河网稠密，过境水多，水源十分丰富。除此之外，该地区降水也较为充沛。全市的年平均降雨量一般都在 1000 毫米以上。由于处于亚热带季风区，一年之中的降雨量并不均衡，有两个雨季和两个相对的干旱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峰特点。嘉兴地区的这种降雨分布特点对水稻生产的顺利进行有着积极的影响：就两个雨季而言，第一个一般出现在上半年，雨季较长，往往能从 3 月中旬持续到 6、7 月之交，晚者可至 7 月上旬甚至中旬，总计 120 天左右。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段，3 到 5 月为春雨，此时的春雨雨量一般不大，很少出现大雨、暴雨，但往往连绵不绝。6 到 7 月为梅雨季节，此时由于受季风气候影响，雨量一般较大，大雨、暴雨较为频繁。3-7 月的年平均降水往往在 450-500 毫米之间，将近占全年的一半。这一时期，水稻正处于旺盛生长期，需水量大，因而丰富的降水对水稻的生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可谓适逢其时。第二个雨季一般出现于 8 月中旬到 9 月中旬间，长约 30-40 天。因受热带风暴甚至台风的影响，这一时期，嘉兴地区的降水往往多而骤急，对夏季高温闷热的天气起到了很好的缓解作用，也为水稻的最终成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当然，嘉兴有时也会出现不利于水稻作业顺利进行的气候特征，如夏季降雨量过大，便会导致农田淹没，庄稼遭受重大损害。但总体而言，嘉兴地区的降水分布对水稻生产是利大于弊的，这也是嘉兴成为著名稻作生产区的重要自然条件。

就气候条件而言，嘉兴地处亚热带北缘季风区，十分适宜于农作物的栽培与生长。如前所述，季风气候直接影响了降水量的分布，在正常情况下基本能与水

稻的生长周期保持一致，对水稻的生长具有积极作用。就温度条件而言，嘉兴地区年平均气温为15-17摄氏度，1月为最冷月份，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7月为最热月份，月平均气温为27-30摄氏度，全年的无霜期能达到230-250天，10摄氏度以上的积温能达到5000摄氏度，高低温的月份分布和持续时间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优越的温度条件，这也决定了嘉兴水稻生产的周期一年可达两熟甚至三熟。

就土壤条件而言，嘉兴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的杭嘉湖平原，全境属于第四纪沉积，土地平衍，土质肥沃，优质土壤占土地面积的 90％以上，为水稻等农作物的栽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史料记载，秦汉以前，嘉兴境内虽地势平坦，但因人口稀少，耕地面积并不广阔。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南宋，经过北方人口的三次大迁徙，嘉兴越来越多的农田被开垦出来，优质土地也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南宋之时，政府还组织了围湖造田活动，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到了明代，嘉兴已成为人口密集之地，境内耕地得到了较为充分地开发与利用，甚至出现了“寸之土必耕”的现象。历代史书对开垦的耕地的数量均无准确记载，但大体来讲，耕地不断增多的趋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到了清代光绪年间的《嘉兴府志》记载，明代万历时的土地总数量即以高达 416 万亩，充分说明了明清以来嘉兴已成为江南水稻生产的重镇。

二、稻作生产的悠久历史

嘉兴的稻作生产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成就。桐乡罗家角文化遗址表明在距今大约 7000 年以前，嘉兴境内即已开始人工栽培水稻，并出现了耜耕的原始农业。到了春秋时期，稻作农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据《绝越书》等历史文献记载，春秋时期，嘉区不仅出现了稻、粟、黍、稷、麦等粮食作物以及桑、麻、葛、蔬、果等经济作物，而且还掌握了“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收而聚，冬蓄而藏”的农业规律。但迄于汉代，嘉兴地区仍然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多贫无积聚”的落后状况，稻作生产处于缓慢的起步阶段。

西汉末期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嘉兴农业出现了第一次繁荣。东汉末年孙吴在江东立国，大将陆逊积极倡导屯田、大力发展农垦，“令诸将增广农田”。吴国上下一心，“广开农桑之法，积不资之储”，这一时期，由拳县改名为禾兴，反映了当时重视稻作生产的情形。西晋末期，大批人口南迁避难，嘉兴成为北方人南迁的重要目的地，也由此获得了大批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极大地促进了稻作生产的发展。这一时期，嘉兴逐步发展成为谷帛殷阜，“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的富庶之地。

到了隋唐时期，嘉兴地区的农业发展再一次获得发展的机遇。隋代之时，嘉兴开通了浙西运河。到了唐代初年，则又先后筑成海塘和太湖东南湖堤，使境内广大沼泽地带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开发与利用。“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的又一

次南迁，为嘉兴地区稻作生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当时屯田之风盛行，“浙西有三屯，嘉禾为之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从太湖之滨到东南沿海的广大地区，都在嘉禾屯区范围内。这段时期，嘉兴地区的稻作生产出现了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粮食连年丰收。据统计，当时嘉禾屯区的年粮食产量约等于浙西六州的总和。为此，唐代李翰在《嘉兴屯田记绩颂》序中赞叹“嘉兴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在唐代时，嘉兴的稻作农业生产在江南地区已占据重要的地位。

五代时，吴越国在浙江境内积极治水营田、大修海塘，初步建成了五里一横浦、十里一纵浦，旱则能灌，涝则能排的唐浦圩田体系，为嘉兴地区稻作生产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尤其是宋室南迁后，稻作生产获得显著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劳动力的大量增加，也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明显进步。这一时期出现了耕耙结合的整地技术，培育秧苗、合理施肥、耘耨烤田等栽培技术也得到改进与提升。随着这些条件的成熟，嘉兴地区大力发展“围田”、“坝田”，耕地面积明显增多，水稻产量长期居于较高水平。据史书记载，南宋时的嘉兴“饶稻禾、蚕桑、组绣工作之技，农食海内”，“生齿蕃而货财阜，为浙西最”，一派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以来，嘉兴稻作生产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这集中表现在精耕细作与集约经营的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农桑牧渔综合经营的生态农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据《补农书》记载，当时的粮食产量：“亩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三石为常年，下路湖田，有亩收四、五石者。”明亩产米一石，合今市制亩产谷 200 余斤，当时亩产可达四、五石的产量，这已说明明代之时嘉区的稻作生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近代以来，嘉兴地区作为重要的鱼米之乡，稻作生产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商品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三、稻作生产与稻作文化

就文化的起源而言，任何形态的文化均是由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在长达六七千年的稻作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嘉兴地区的稻作文化逐步形成、发展与定型，并成为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文化形态。

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与认知力的低下，嘉区农民对许多与稻作生产紧密相关的自然现象，如气候、病虫害等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们往往将农业的兴旺丰收寄托于神灵的庇护，于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祭祀礼仪，这些古老的祭祀礼仪沉淀下来，逐渐演化成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如长期流行于嘉兴稻作生产区的祭祀天神的祭天活动、祭祀土地神的做社活动，直接祭祀稻田的祭田祖活动，祭祀耕牛的春牛会，在求雨时祭祀龙王的活动，为了顺利进行灌溉排水而进行的祭车神的活动等等。

随着历史的发展，勤劳智慧的嘉区农民在稻作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实践，他们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如水旱轮作、以田养田，农牧结合、粮畜并举，以水肥土、田地互养等等。以这些生产方式为基础，嘉区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产习俗，如农民为了积肥，不仅养成了冬至动土、清理粪缸的习俗，还形成了水乡特有的挖河泥、以稻田土培桑、抽地筋等习俗。再如在长期阴雨连绵时节，农民为了驱云赶雨，便产生了农家妇女剪纸“扫晴”的习俗。此外，由于稻作生产的作息特点，嘉兴地区还形成了息夏、讨夏衣与望端午等习俗。

为了适应生产劳作，农民在农事活动中需要穿的灵便、轻巧，这又形成了嘉区的服饰文化。如旧时嘉兴农村女子流行穿大襟短衫、长裙、小围身、肚兜、包头巾，男子流行穿对襟布衫，纽扣九至十三道不等，其中蓝印花布衣更体现出嘉兴独特的服饰文化习俗。

稻作生产也直接影响了嘉兴地区民间口头文学的发展。嘉兴地区产生了许多关于稻作生产活动的民间故事，如白雀护丰年的故事、踏车星的传说等等，这些民间故事反映了嘉兴农民对稻作生产中一些现象的思考与想象，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农民在劳作的过程中，为了缓解疲劳、表达见解、抒发感情，往往也会创作出许多生动优美的民间稻作歌谣，使繁重辛劳的稻作生产本身也体现出一丝诗情画意。

稻作生产还直接影响了嘉兴地区的民间饮食习俗。我们知道，嘉兴不仅是江南水稻的源头，也是江南稻米的主要产地。早在几千年前，大米早已成为嘉区的主食。不仅如此，聪慧灵巧的嘉兴人还以大米为基本原料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如嘉兴粽子、嘉兴团子、米酒、年糕、甜茶等等。这些特色食品不仅可以调节人们的日常饮食口味，还与嘉区的许多岁时节令结合起来，形成丰富多彩的的民俗风情，如嘉兴清明有吃苦粽子的习俗，农历二月二日有作撑腰糕、吃撑腰糕的习俗，立夏之日有烧野米饭的习俗等等，这些饮食习俗同样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稻米生意也逐渐兴旺起来，围绕稻米贸易，嘉区形成了某些商业习俗，如为了获取最大商业利润而逐渐形成的“进在瘟潮，卖在风潮”的米市经营习俗；为了了解行情、洽谈生意而进行的米茶会习俗；为了保守商业秘密而使用稻米商业密语的习俗；为了求得米市兴隆、财源广进的崇拜五路财神和米业祖师爷蒋氏二兄弟的习俗等等，这些习俗深刻地反映了嘉区商业经济的发展进程。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嘉兴的稻作生产方式，而稻作生产的悠久历史又孕育了嘉区极具特色的稻作文化。嘉区的民俗风情是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从生产习俗、民间信仰、生活习俗、商业习俗等几个展现着稻作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劳动人们的精神追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